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

□ 韩庆祥

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

只有说清新一届中央所面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才能为“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供合理性根据;只有说清实践新形态,才能形成理论新形态。这是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的逻辑起点。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且具有阶段性本质特征。

国内,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表达诉求一矛盾多发一攻坚克难一治理现代一建构秩序。“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称为“发展起来以后”。十八大以后,我国真正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表达诉求期,民众的各种诉求在增强。

民众日趋增强的诉求需要合理满足。满足,需要主观与客观条件。然而在当下,不仅在客观上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资源配置还不够公平;且在主观上,一些人的文明素养也不是很高。结果是,民众日趋增强的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进而产生各种矛盾,进入了矛盾多发期,使深水攻坚成为时代课题。

如何真正破解“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难题?习近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难题,而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提供现代化制度模式,又要处理好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新一届党中央不仅要破解难题,还要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新一届党中央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着重从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且从国家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入手,运用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等方式治国理政。

国际,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民族复兴一力量博弈一围堵打压。当今,中国已属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国已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接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目标,初步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当新兴大国的实力日趋靠近既成大国并对既成大国构成某种挑战的时候,既成大国往往会对新兴大国产生警惕;当新兴大国谨慎行事而既成大国还没有感到新兴大国对其产生严重威胁的时候,各方就会进行力量和智慧的博弈。当今,世界上新兴大国与既成大国的博弈日趋突出。

在力量和智慧的博弈中,因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难免会有不同程度

的冲突,这种冲突会以围堵打压的方式出现,且时常发生。

总体上,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可概括为:当今中国正处在整体转型升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斗目标上,由实现“总体小康”走向实现“新三步走”战略;在改革上,由“基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走向“基于公平正义的改革”;在生产上,由“投资驱动发展”走向“创新驱动发展”;在生产关系上,由“收入差距过大”走向“分配正义”;在国家权力上,由“国家主导”走向“国家治理”;在文化心理上,由“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信”;在外交上,由“回应问题”走向“提升话语权”;在国际地位上,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强国”。

在上述情境下,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时代性课题

这讲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所要回答的“新课题”。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具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治国理政不仅从破解问题和难题切入,而且是针对问题而进行的。

根据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及习近平的“新三步走”战略,习近平治国理政要回答的“时代性课题”是: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前者是治国理政的目标问题,后者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过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问题,治国理政的目标相对侧重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相对侧重于破解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根本问题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问题。我们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十分明确;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也要基于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以建构良性社会秩序,二者共同回答如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哲学思维

这讲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论述”蕴含的哲学思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习近平

那里,可概括为“战略辩证法。”

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首先是一个战略性历史课题。战略性课题就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作为治理世界上超大型大国的总书记,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关系和难题需要破解。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树立辩证思维。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要运用辩证法来把握,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把握战略谋划和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

战略辩证法要求注重历史思维。它把“战略”和“辩证法”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战略辩证法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辩证法,它既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又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求有效化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关系。系统思维的战略辩证法是空洞的战略辩证法。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思想,就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战略上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关系。战略思维,就是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关系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注重透过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创新思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在要求推进创新。实现战略目标必须注重创新,它是在创新中逐步实现的。缺乏创新,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习近平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具有战略性,它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又具有辩证性,它要求必须辩证处理好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还具有创新性,它是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系统思维。战略是在把握事物的整体及其结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缺乏对事物整体及其结构的把握,就不会有战略思维,也不会有战略理论与实践;辩证法内在要求把握并处理好事物的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否则,就不是辩证法。

核心理念

理念从本质中提升。我们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于这一本质,习近平把“为人民担当”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开篇,是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之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演讲词。其主题,讲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一主题,全篇讲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他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可简称“为人民担当。”这一理念,既与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又赋予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担当起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根本利益的责任,以敢于担当的精神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总体思路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形成了“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的治国理政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首先是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难题。诸多矛盾和难题不破解,就根本无法前行。习近平强调指出:问题倒逼改革,即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种种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难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一部曲。

在破解难题的同时或之后,应注重建构秩序。这不仅是因为以往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难题与缺乏良性的社会秩序有关,而且只有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减少今后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难题,才能激发和汇聚社会正能量。根据习近平的论述,建构良性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是:基于公平正义理念,发展和完善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既使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达到协调、配合,又要健全并发挥好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运用法治、德治、共治和自治治理好国家公共权力,规范和调整社会运行体制机制及其方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的行为;建立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新秩序,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二部曲。

建构秩序的目的,是唱响中国梦。要真正唱响中国梦,必须实现“新三步走”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那时,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就会显示其强大力量,进而拥有国际话语权。唱响中国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三部曲。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论点摘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一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一企业治理框架、国家一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国家一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国家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以上这三个框架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有利于全面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的基本内涵,完整揭示其主要价值,而且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理论的科学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孙洪敏文,摘自《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3期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众期待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企业应该对消费者、环境和社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它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必然要求。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公众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比较高,但对企业履责情况的评价却相对比较负面。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积极推进社会责任法制化,健全相应惩罚制度,完善软约束激励机制;企业应进一步强化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意识,加大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易畅文,摘自《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理论部主办

本版责任编辑:

曹建文

联系电话:

010-67078606

电子邮箱:

gmrzz@126.com

美术编辑:

袁昕

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

□ 张雅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带领人民致力于实现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飞跃,以促进公共性价值回归的美好愿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必须牢牢把握“公共性”这一核心价值,实现权力、职能、制度和法治等治理要素的规范和完善,从而在统筹推进“四个全面”和战略布局中,开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

权力的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核”

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而权力的公共性程度则取决于对“权力为少数人所拥有,还是为全体人民所拥有”这一问题的回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国家权力的公共性集中体现在权力行使的根本原则是“人民本位”,即实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权力的公共性,凸显于妥善解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中,国家必须始终秉持公共性原则,保持自身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界限,力求实现二者之间的双向平衡与和谐发展。权力的公共性,体现为合理设计权力的架构。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我国权力制衡架构必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议行合一”原则为基础,以决策权、

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约与协调作为体现形式。权力的公共性,落在有效选择权力的实现路径。国家只有具备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效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合理设计治理制度的能力、有效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广泛吸纳民意的能力,国家权力的公开性才能在治理实践中得到落实。

职能的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道”

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的组织载体,优化国家机构的职能结构和履职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道路。纵观新中国60余年的治理实践,从建国之初的“政治导向型治理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导向型治理模式”,再到21世纪初以来的“服务导向型治理模式”,充分显现了国家治理职能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逻辑,凸显的是公共性价值逐渐回归并不断增强的轨迹。

职能的公共性,回答的是“为了谁”的问题,这要求国家将“公平正义”作为职能导向。政府职能的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地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即在分配资源、提供机遇、供给服务、分享成果方面都要公平公正,努力使每一社会群体、每一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尊严都得到有效的维护。职能的公共性,回答的是“做什么”的问题,这要求国家将“公共服务”作为职能重心。国家应着力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并重点解决

关乎民生的诸多重要问题。职能的公共性,回答的是“何为好政府”的问题,这要求政府将“人民满意”作为职能目标。

制度的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盾”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可见,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后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实质上强调了制度公共性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具有公共性的制度体系是程序正义与目的正义的统一,表现在制度的公益性、公平性和制约性三个方面。制度的公益性,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始终将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要求国家在立法过程中超越自利性的诱惑和利益集团的绑架,制订出更具普惠性的法律制度。制度的公平性,即制度体系能体现民众的公平正义之诉求,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制度的制约性,即在制度上对公共权力进行规范,这要求国家建立起一个科学规范、严明确正的制度体系,促使公共权力做到边界清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法治的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两次重要全会精神犹如“车之两轮”和“鸟之双翼”,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和公共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法治作为法律的实施过程,其公共性体现在为人民利益的实现提供根本保障,从而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性体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所有层面,贯穿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个环节。在立法领域,公共性体现在科学立法与公平立法的统一,要求国家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

在执法领域,公共性体现在严明执法与民主执法的统一,要求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公开、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并且公众参与、民主监督纳入到执法过程之中。

在司法领域,公共性体现在规范司法与公正司法的统一,要求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在守法领域,公共性体现在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

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党竞争是普遍的政治现象,中国最初对政党政治的探索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现有的九大政党是如何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走向合作的?让彼此独立、政见各异的政党走在一起最深刻的思想动因是什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对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自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回到多党合作的历史源头,探索凝聚政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政党合作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来自现实的政治需要。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它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这种现实关怀中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立场。探究政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就要在对时代主题的梳理中找到各政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主张。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抗战时期我们主要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救亡图存,二是建设现代国家。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当之无愧成为当时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此外,中国还面临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任务。现代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思考,因此,在“抗日”这一时代主题的解决过程中,“民主”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成为抗战时期的又一时代主题,它与“抗日”这一历史课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抗战时期各派政治力量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正是在对“抗日”与“民主”这两大时代主题的解答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举起“爱国”与“民主”的旗帜,找到了推动合作的价值纽带,因此,爱国与民主,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思想基础。而爱国与民主又是密不可分,这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治主张的最大公约数之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传统,它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达到高潮后,抗战时期不同政党对它的理解依然是有分歧的。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建国方案,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案,民主党派的第三条道路救国方案,乡村建设派、平民教育派、职业教育派的教育救国方案等等,都围绕着救亡与启蒙的主题进行试验,都是爱国主义勃发的具体表现。那么,如此多元的爱国主义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基础?答案正是在于爱国与民主的交织,推动了爱国主义的现代化演进,这个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完成的。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握争取民主作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环节,认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这种观点,得到了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呼应,如民盟领袖张澜明确表述:“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述,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条。而尤其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可见,正是在爱国与民主这个结合点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彼此吸引靠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政党合作终成现实。

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思想基础,可以得出如下启示:第一,共同的价值观是把政党联合在一起最深沉的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爱国与民主的共同信仰与共同追求,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能够携手前进、共创伟业。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向联合,就在于它们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政治纲领同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正是立足于爱国与民主,它们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不断发展、拓宽和深化,为多党合作制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也需要巩固彼此的价值认同。第二,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要与时俱进。从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嬗变来看,共产党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了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并适应这种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立场,并最终形成“联蒋抗日”的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得以形成,这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明确回答时代主题,都必须构建与时代主题相一致的意识形态。那么,当前我们面对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多党合作应该如何在意愿形态上积极应对?我们如何顺应民主的潮流,推动政治制度和人类进步?这些都是我们要积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唯有如此,和谐政党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多党合作才能健康发展。第三,参政党要继承和发展爱国、民主、求实的传统,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多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抗战时期及以后,民主党派秉持着爱国、民主、求实的科学精神,放弃了最初的“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并最终和共产党一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符合历史规律的正确选择,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如今70年已经过去,参政党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爱国、民主、求实的优良传统,才能更好认识时代和任务的根本变化,更好地地履职尽责,从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把多党合作推向新的高度。(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王彩玲